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

张胜¹ 徐有威²¹

(1.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2. 上海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44)

【摘要】 1981年,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原则, 开启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 安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 部分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 但并未放弃民品生产。20世纪90年代, 这些企业大力改革、多措并举获得了较大发展。至世纪之交, 这些企业再次陷入危机, 纷纷以兼并、破产和“债转股”等方式应对困局。尽管其效果并不理想, 但这些企业在新阶段依然展现了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 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亦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小三线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 国有企业改革 安徽

【中图分类号】 F279. 27. 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62X (2022) 01-0017-008

20世纪60年代中期,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际环境和周边紧张局势, 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小三线作为对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补充和衔接也随之开展建设。改革开放后, 小三线军工生产体系已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国防工业发展新形势。1981年,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报告, 提出小三线进行调整的基本原则: “着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 适当保留军品生产线, 变单一军品生产为军民结合的生产结构; 对于要调整的工厂, 应贯彻少关停、多并转的方针。”^[1]这一调整原则随后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复准。自此, 小三线建设企业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 这些企业的调整改造、兴衰成败, 对所在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均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安徽省皖西大别山区和皖南部分山区由于其地理环境符合小三线选址要求, 资源物产丰富, 成为小三线建设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 皖西是安徽本省小三线建设主要地区, 皖南是上海小三线建设主要地区。上海之所以选址皖南, 主要是其自身没有适合小三线建设的地形地貌, 从而造就了位于皖南的上海“飞地”。²就安徽本省小三线而言, 后时代之初, 小三线企业普遍发展民品, 但未能解决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效益差等现实问题。20世纪90年代, 大部分企业调整搬迁至合肥等中心城市, 开启发展新阶段。^[2]学界对于后时代小三线企业发展已有一些研究, 涉及部分区域的个案考察。³然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 这些被调整后的小三线企业究竟做了怎样应对, 取得了哪些成就和经验, 仍未详尽探讨。鉴于此, 本文基于对档案、企业志和口述史等资料梳理, 侧重考察20世纪90年代安徽小三线企业⁴的发展脉络、成效与不足。

¹**作者简介:** 张胜(1989—), 安徽霍山人, 历史学博士、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新中国史; 徐有威(1964—), 江苏吴县人,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新中国史、三线建设。上海大学二级教授, 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获得者。2013年以来, 主编《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8册)、《口述上海: 小三线建设》; 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7辑); 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学术杂志发表小三线建设论文近80篇。近10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17ZDA207)

一、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企业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后，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逐步确立了以“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随着国防工业发展方针的转变，以轻武器生产为主的小三线企业发展路径随之调整，在完成军品任务的同时，民品逐步成为了这些企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

部分小三线企业保留了军品生产能力，同时发展民品，实行“两条腿走路”。东风机械厂制定了“军品系列化民品规模化”的发展方向。该厂还深化横向联合，促进民品发展走集团化道路。在合肥市政府、安徽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安徽省国防科工办”）、合肥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帮助下，东风机械厂于1995年3月22日，正式宣布加入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更名为“美菱集团安徽东风机械总厂”。东风机械厂加入美菱集团后，“保留法人地位，保留军工番号，军品生产相对独立，军工生产管理渠道不变，企业民品部分的人财物、产供销由美菱集团统一管理”。^[3]有些企业则重点推动民品发展适应市场化的新形势。红星机械厂为发展民品，拓展市场，成立销售公司开展销售业务。1999年12月，为加强销售人员队伍建设，红星机械厂还在全厂范围内“公开招聘销售人员和销售负责人”，“所有的销售人员竞争上岗，运用现代人事管理知识，采用科学的招聘方法，使一大批素质高、懂业务、懂营销的人员充实到销售人员队伍中”。^[4]

部分企业不再承担军品任务，转产民品。其中以淮海机械厂发展规模较大。至1994年，该厂“生产能力在全国汽车行业由1993年第28位跃居第17位，企业成为安徽省工业企业百强之一，位居合肥市工业企业十强第六”。^[5]皖江机械厂“1986年，开始完全脱离军品生产，先后生产摩托车配件、高压开关等产品。1987年，成功开发织袜机整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抓住搬迁进城机遇使生产线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行列”。^[6]实际上，大部分小三线企业调迁到城市后都不再承担军品任务，大力发展民品是这些企业生存下去的唯一路径。

部分小三线企业军品生产能力得以保留。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量小三线企业以“关、停、并、转、迁”的方式调整，至1989年，全国地方军工企事业单位减少到194个。^[7]在这一背景下，安徽部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至1989年，生产军品任务为主的企业仅剩皖西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红星机械厂、江北机械厂、皖淮机械厂和红旗机械厂。至1994年底，国务院批复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关于军工科研生产能力调整改革的意见》，正式揭开了20世纪90年代军工科研生产能力大调整的序幕。^{[3]404}皖西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红星机械厂、江北机械厂和皖淮机械厂是后时代安徽主要生产军品的小三线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大力发展民品，但军品生产始终是这些企业的重要任务，民品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贡献相对较低。1994年9月，东风机械厂在了解到国家将进行军工科研生产能力调整的信息后，“委托厂长张友仁赴北京积极进行预先公关”，争取保留工厂番号。“在京期间，张友仁向兵总设计计划处、兵总引信处、地方规划处及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等部门主要领导宣传介绍了工厂及主要产品”^{[3]404}，以此争取保留其军工生产能力。同时，安徽省政府与省国防科工办亦对有关企业军品生产线的保留给予了积极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皖西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红星机械厂、江北机械厂和皖淮机械厂的军品生产线均得以保留。

总的来看，这些企业军工生产能力之所以能保留下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些企业努力进取、不断创新，形成了拳头产品。例如，东风机械厂研制的引信、皖西机械厂的整弹和红星机械厂的火工品组成的生产线是国家调整保留的唯一的82毫米系列迫击炮弹生产线。^{[3]408}皖淮机械厂早在1980年就生产出了超过设计指标的72式反坦克地雷，1984年还获得了安徽省国防科工办授予的“优质产品”称号。^[8]以军品生产为主的后时代小三线企业进取创新，形成了自身的拳头产品，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这些企业具有相对较好的技术、质量和信誉。安徽省皖西机械厂“凭借在中小口径迫弹领域先进的技术、可靠的质量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国防科工委等有关部门的信赖”，军工生产能力才得以成功保留。^[9]再次，相关企业联系紧密。早在1964年10月28日，中共国防工业党委就在《国防工业一九六五年工作要点》中要求，“必须坚决按照规模小、专业化、新工艺和协作的原则进行建设，决不能再建设全能的、综合性的工厂”。^[10]此后的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遵循了这一原则。因此，安徽小三线企业在搬迁之前就存在高度的协作关系。例如，东风机械厂的部分产品出现问题，甚至会“影响990厂相关产品生产”。

^[11]搬迁后，部分企业仍有协作生产业务，这种密切的协作关系亦成为保留安徽省相关军工企业的因素之一。

这些企业产品普遍为消耗品，需求量相对较大。据亲历者忆述：“枪、炮在和平年代损耗小，一般都入了库房。像皖西机械厂、江北机械厂等单位生产弹药，是消耗品，需求量相对大一些。”^[5]因此，无论从产品本身抑或产品需求考虑，皖西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红星机械厂、江北机械厂、皖淮机械厂等企业军品生产能力保留与发展都具有一定优势。

二、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小三线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背景下进行改革、调整和转型，不可避免地给企业带来一些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企业负债高、效益差，经济困难。改革开放后，小三线企业军品任务就已大量减少，民品发展并不平衡，一些企业能够维持生存已然不易。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大部分小三线企业由于搬迁到城市，资金不足问题凸显。截至 1991 年 8 月，淮河机械厂共投入迁建资金 2000 万元，其中贷款 1400 万元，企业自筹 600 万元，企业搬迁所需资金“还缺口 400 万元”；江北机械厂要完成迁建任务，“还需 2400 万元，企业至多只能自筹 900 万元，尚缺 1500 万元”。^[12]因而，贷款搬迁成为这一时期小三线企业普遍的应对措施，而产生的负债逐渐成为企业负担。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初金光钢厂“因搬迁投入资金量大，企业借贷多、负担重。累计贷款 6300 万元，年付利息 600 多万元，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还款难度很大”。^[13]个别企业“搬迁所必须的几千万元费用和土建安装工程的支出 90% 以上均依靠银行贷款”。皖淮机械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资金投入的取消，企业经济十分困难”。^[14]

第二，部分企业与接收城市矛盾显现。安徽小三线企业全部下放到地方城市，部分企业与接收地政府矛盾逐步显现，原因在于小三线企业原隶属安徽省国防科工办，根据国务院军转民的要求“下放”到有关城市，城市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又将企业进一步交给下一级区政府或有关的行业归口单位管理，导致部分小三线国有企业级别未下降，但管理单位级别降低。加之，小三线企业在军、民品生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问题，致使部分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管理体制存在诸多不顺。以红星机械厂为例，该厂恢复生产后与当时的企业所在地合肥市东市区潜在矛盾日益显露，矛盾焦点集中在管理体制上。从企业发展考虑，管理体制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一是“军品和军管民品的管理问题”。该厂属军民结合型企业，军品和军管民品（民爆器材）利润高，且有国家订货，仍是支撑该厂生存和发展的主导产品。这两类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科研、生产计划、原材料供应、安全以及军品生产优惠政策等问题的贯彻落实，都需要通过专门渠道进行管理。而搬迁后由接收城市合肥东市区中转，企业不能适应。二是“民品的行业支持问题”。该厂射钉紧固器材（射钉弹射器、射钉）已形成完整产品系列，当时全国只有 2 家，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但是，该厂仅搬迁贷款就已达 4000 万元，难以继续申请贷款发展民品。因此，该厂希望实行归口管理，在政策上、资金上、技术上得到支持与帮助，而东市区难以提供上述帮助。三是“企业的政治待遇问题”。该厂当时是国家二级企业，隶属省国防科工办，一直享受县级企业政治待遇，由于搬迁原因，到了合肥东市区后一直未能恢复县级企业政治待遇。合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召开大中型企业负责同志会议也未能参加。这也导致企业对有关政策信息了解掌握不及时，影响工作。^[15]由于以上种种体制的不顺，导致企业内部想脱离东市区政府的意见不断出现，而东市区政府在前期接收红星机械厂过程中，已经给予了该厂大量优惠政策，此时显然难以接受企业的脱离诉求，双方矛盾亦随之升级。

以上问题并非个案。皖西化工厂布点在当时的合肥市郊区，“行政隶属关系也归郊区政府，成为当时郊区唯一的一家国营企业，与郊区以管理乡镇企业为主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16]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安徽省政府支持并批准筹建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军工集团”），并将原隶属合肥市的皖西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红星机械厂和原隶属蚌埠市的江北机械厂等 4 个企业，改为隶属安徽省国防科工办，加强了对地方军工企业管理。然而，大部分转向民品生产的企业只能努力融入城市发展，并在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中或被兼并，或破产重组，或进行股份制改造，命运大相径庭。

第三，部分企业职工生活困难。不可否认，大部分安徽小三线企业迁入城市后，具备了较好的生活环境和市场条件，有关城市亦在调迁期间给予了小三线企业较大支持。但随着各项搬迁优惠政策截止，职工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在一定时期内难免遇到各种困难。究其原因，部分企业搬迁后，仍处于城市边缘，远离中心城区。部分企业住房矛盾较为突出。例如，金光钢厂在职工安

置过程中，由于厂里经济较为困难，“职工们只得采取群众集资的办法来解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现钱，很多同志是临时借来的，有的连夜写信八方求援，有的卖掉了家中的猪，卖掉了家中的粮，在不长的时间里，凑了 100 万元，户均 1200 元，目睹此情此景，一贯坚强的厂长眼睛湿润了”。^[17]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职工家庭的经济负担。此外，企业搬迁伴随着大量职工家属的进城，短时间内家属难以全面安置亦成为职工生活困难另一诱因。虽然，这些企业职工在搬迁后确实面临一定的生活困难，但客观来看，城市中具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亦不断提升，这些因素对于搬迁后的职工生活和融入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三、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制度改革

后时代小三线企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离不开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由此，改革创新、着力推动自身要素发展成为这些企业继续前行的因应举措。

其一，实行“三项制度”改革。“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用工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项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时期国营企业体制的固有弊病以及企业职工思想观念的滞后是企业制度改革的主要阻力。以皖西机械厂为例，该厂先后制定了《关于实行岗位合同制的暂行办法》《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暂行办法》《关于工资制度改革的暂行办法》，并提出了分设岗位工资、职务工资的设想。同时，该厂积极探索干部制度改革，按照“干部能上能下”的原则对中层干部采取公开招聘、民主选举、民主推荐或由主要负责同志“组阁”产生。从 1995 年 6 月起，皖西机械厂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工厂工人、干部身份被彻底打破。^{[9]109}红星机械厂着力减少富余人员，引进人才，调动积极性，制定了《“三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有关劳动用工管理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并且根据工厂生产经营的需要，有计划“按定员、定编、定额合理配备人员，压缩非生产人员，以满足生产第一线的需要，严格控制一线岗位的职工向二、三线岗位倒流”，推行厂内退休制度、厂内待业制度、职工“停薪留职”制度、厂内“休长假”制度等。^{[4]94-95}这对于企业充分利用生产力优势，淘汰冗余、节约资金亦有积极作用。

其二，重视科研创新。部分企业设立专门机构、提供专项经费，用于科研发展。红星机械厂于 1998 年 10 月成立技术中心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厂长兼任技术中心主任，总工程师兼任中心副主任。技术中心财务实行单独列账，工厂每年按不低于销售收入的 3%提取资金作为技术中心开发经费。红星机械厂技术中心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1999 年 1 月，安徽省经贸委、省国家税务局等部门批准红星机械厂技术中心为省级技术中心。^{[4]211}同时，一些企业还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展开合作，实行了厂校、厂所挂钩，进行部分产品的联合研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其三，推行经济责任制。中国的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企业自主权扩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进入后时代，小三线企业继续推行经济责任制，着力提升效益。1997 年东风机械厂在原有改革基础上制定了《1997 年经济责任制承包方案》，实行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安全生产，保证产品成本”为主要内容的多种经济承包责任制，包括单位承包、单项承包、营业额承包、个人承包等形式。为配合方案执行，东风机械厂还及时制定了《经济责任制考核细则》，“对全厂机关、车间按月分组从产品产量、进度、质量、安全、生产现场、综治等 14 个方面，制定具体考核内容、要求、办法和评分标准，按百分制进行评分，并与单位的经济效益挂钩”。^{[3]60}有关企业在实行经济责任制过程中对其具体内容不断补充修订，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其四，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后时代小三线企业不断推动民品发展，并积极引进外资。1995 年 12 月 22 日，合肥市计划委员会对安徽省红星机械厂与港商举办合资企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同意安徽省红星机械厂与香港大永真空有限公司举办合资企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合资期限十二年。”^[18]合资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射钉弹和射钉等系列产品，这个项目推动了红星机械厂的民品发展。

其五，推动企业升级。自 1986 年 7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安徽省大力推进国营企业

升级改造工作，安徽省国防科工办对企业升级问题进行具体规划。东风机械厂于1989年5月开始进行“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争创省级先进企业的升级工作。为做好企业升级工作，工厂制定了“1个目标、2个重点”的企业升级规划。1个目标即：1990年进入省级先进企业行列，1991年争创国家二级先进企业。2个重点即：一是以整顿完善七项管理基础工作为重点，理顺纵向、横向关系，特别要在定额、标准化、计量、信息工作上重点提高、深化，以奠定企业升级的基础；二是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为重点，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保证体系和全面采用节能降耗措施。^{[3]56}1992年7月，东风机械厂获批安徽省中型一档企业，后又获批“为1995年度全国新增大型二档企业”。^{[3]58}红星机械厂早在1990年4月初，即“通过了国家二级企业的全面评审”。^{[4]200}企业升级是企业自身全面发展提升的结果，企业争创升级的过程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促进了企业本身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

除以上主要措施，这些企业还大胆突破，多措并举，如加强售后服务、开展国内企业合资经营等，有力促进了相关企业在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继续发展。以金光钢厂为例，该厂不仅积极改变所有制结构、推进合资经营，还通过加强内部管理等举措发展企业。1993年9月20日，蚌埠市重工业局审批同意安徽省金光钢厂在深圳市与深圳国晖贸易有限公司联办“工贸公司”。^[19]这一方案对于拓宽企业发展维度具有积极意义。至1998年，金光钢厂“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减员增效、压缩非生产性支出等措施已基本稳定了局面”，并保住了市场。^[20]江北机械厂在发展军品的同时不断拓展民品生产，1987年11月，“工厂被省机械工业厅列为工程机械油缸专业生产厂家。生产的液压油缸不仅为省内挖掘机、铲运机、装载机、叉车配套等，还供应天津、山东、南京等省市”。^[21]至1994年，该厂“民品生产已具年产工程液压油缸500台（套）的生产能力”，并进一步规划生产小型挖掘铲土机和小型（轮式）装载机。^[22]皖西机械厂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开展二次创业，该厂“1986年工业总产值仅1312.4万元，1998年实现军民品销售收入10083万元”。^{[9]7}

四、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命运各异

至20世纪90年代末，后时代小三线企业逐步陷入生存危机，部分企业严重亏损，资不抵债。1998年的原先锋机械厂“严重亏损且资不抵债，已无力偿还银行到期债务”。巨额的亏损，不仅制约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导致了企业后续贷款已无可能，流动资金枯竭，生产经营陷入巨大困境。^[23]也有部分企业行业市场较好，却由于资金困难，缺少流动资金，无法盈利。1998年前后，在针织机械营销市场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安徽省淮河机械厂却由于缺少流动资金，“只有坐失良机”。^[24]至2000年前后，该企业职工退休工资⁶不但没有增长，反而逐渐减少，甚至拖欠。部分退休职工生活极为困难，“已到无法生存之际”，迫于无奈，退休职工只能求助主管部门“主持公道”。^[25]

从全国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普遍面临困境，后时代小三线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难以独善其身。部分学者已就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困难原因进行了总结。⁷加之，大部分后时代小三线企业还需面对搬迁巨额债务，其困难处境可见一斑。

国有企业面临困境，中共中央高度重视。1997年9月，中共中央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部署，决定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同时，对国有小型企业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破产等形式的改革，加快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26]1998年，国有企业进入了三年改革脱困时期，安徽省陷入困境的后时代小三线企业在国家政策影响下以及有关城市、主管部门的帮助下，以债转股、被兼并、破产和重组等具体方式应对困局。

首先，对主要军品生产企业进行“债转股”。三年改革脱困期间（1998—2000年），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国家对部分国有骨干企业的债务问题实行“债转股”，即将银行与企业的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的持股与被持股关系。^[27]以此帮助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渡过难关。安徽省国防科工办在获得有关“债转股”政策信息后，“随即前往省、国家经贸委、国防科工委，分别汇报争取”。^{[3]42}此后，安徽省国防科工办下属企业积极准备材料，推进申报工作。在申报过程中，安徽省最初是以皖西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红星机械厂、江北机械厂4家企业各自作为“债转股”主体，虽经多方努力，但终因“盘子”太小而争取未果。安徽省国防科工办随即调整战

略，改为将以上 4 家企业捆为一体并以安徽军工集团的名义上报，这一方案获得了安徽省政府、国家经贸委的赞同和支持。^{[4]128}最终，通过“债转股”的实施，皖西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红星机械厂、江北机械厂 4 家企业 3.5 亿元的中长期贷款中 2.55 亿元实施债转股，资产负债率由 80% 下降到 35%，转股后每年应支付银行的贷款利息可以下降 1500 万元以上。^{[3]44}由此，以上 4 家企业债务得以减少，企业减轻了负担，经营得到改善，效益得到提高，安徽军工集团的班底企业得到了重生契机。

其次，对转产民品的企业进行兼并、破产与重组。转产民品的后时代小三线企业，并没有获得“债转股”的机会。面对经济效益滑坡的企业困境，部分企业开始寻求被兼并，以解决这一时期的资金困难。以淮河机械厂为例，该厂整体搬迁到蚌埠市后，企业经济效益滑坡严重，生产长期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职工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针对淮河机械厂的问题，安徽省蚌埠市于 1997 年 5 月组成了三级联合调查组，对该厂“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查，通过调查分析，作出了调整厂级领导班子，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由蚌埠灯芯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灯芯绒集团）对该厂实施兼并”。虽然这种兼并在一定阶段内延缓了企业倒闭，推动了部分资产被兼并企业再利用，但淮河机械厂的兼并重组并未触及企业本身的贷款债务、企业制度等核心问题，因此，这种兼并对于企业发展意义仍显不足。

部分民品生产企业难以为继，不得不依法破产。早在 1986 年，国家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至 1994 年，国家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法律和政策上，为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提供了保障。20 世纪末期，国有企业在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时，企业的破产重组不仅可以使无法走出困境的企业减少亏损，同时可以减少银行坏账。在考察先锋机械厂是否破产问题时，合肥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协调小组指出：“破产有利于加快军工行业内部结构调整。目前企业已无力参与市场竞争，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破产的结局在所难免。破产后，不仅可以消灭一个亏损源，而且有利于推进军工行业内部结构调整。同时，可以利用国家有关规范破产的政策，从根本上解除银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先锋机械厂无力偿还银行到期债务，一方面造成企业负债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银行不良资产，给当地金融稳定带来不良后果。从当地政府角度考察，通过依法破产，可以利用国家政策，按规定核销银行坏账，减少银行资产损失。因此，这一时期部分企业选择了依法破产。

然而，企业破产过程会牵涉很多问题，职工安置又居于待解决问题的首要位置。职工安置费用一般由企业资产变现收入支付，不足部分由政府补充。例如，金光钢厂破产前，根据《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初步估测安置企业破产职工费用以企业破产财产变现收入能够满足支付。并补充提出如果“破产财产变现收入不足支付职工安置费用，缺口部分由市财政负责兜底解决”。^[28]另一方面，企业破产后导致职工下岗是不可避免的，安徽省这一时期采取了多项举措，对于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具有重要作用。⁸

总体而言，后时代小三线企业破产与一般的企业破产处理情况相同，即依法以自身所有财产公平清偿给债权人。在破产后，企业的银行债务得以清算，部分企业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重组，以期重新发展。例如，通用机械厂“1996 年 9 月破产重组为合肥精工机械厂。1997 年 6 月，又以合肥恒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挂牌运行”。^{[6]692}部分企业破产资产被其他企业收购。例如，先锋机械厂和合肥手扶拖拉机厂合并后的合肥动力机械总厂在 2001 年 5 月宣告破产，“其破产资产由浙江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组建合肥康恒机械有限公司和安徽友邦混凝土有限公司等”。^{[6]689}

小三线企业作为新中国国有企业体系中的一个小群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被兼并、破产的方式应对困局，并于其后进一步重组，不仅对国有企业实现三年脱困目标、困难企业退出市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地方乃至国家经济社会的长久发展。

余论

后时代小三线企业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为所在地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合肥晚报》曾评论：根据档案记载，小三线企业调整时期，“合肥人口不足 100 万，消费水平也一直上不去，这些‘三线’军工企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设备和

产品，还带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精英”。安徽省国防科工办有关专家指出，小三线调迁至少让合肥增加了5万人口，也为合肥带去了将近20亿的企业资金，为合肥工业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些企业搬迁到合肥后，通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推动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冲破了军事工业多年来形成的封闭状态，结合自身条件，纷纷提出了‘军品做强，民品做大’的战略发展目标，涌现了‘皖安’‘江淮仪表’等航空知名设备企业，昌河、江南等汽车及配件生产知名企业，‘红星’射钉‘皖西’塑料等系列民品”。其中，先锋机械厂搬迁后与合肥手扶拖拉机厂合并成立合肥动力机械总厂，两者“强强联手生产的合肥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和12型农用运输机两个产品屡屡获得部级表彰并畅销海内外……而且他们还完成了气垫式皮带输送机、激光切割机和运输车等三大产品的国家项目”。^[29]此外，进入后时代的小三线企业继续为地方应对自然灾害贡献力量。尤其在调整搬迁期间，部分小三线企业不仅在汛期“要确保山区各危险点的安全”，同时还要担负城市防护部分河坝的任务。^[30]部分企业还在汛期成立“抗洪抢险应急分队”，协助地方防汛抢险工作开展。^{[31][32]}这些企业的付出也体现了军工企业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

尽管进入后时代的小三线企业对所在地经济社会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仍需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一些企业虽继续发展，却亏损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负担。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有企业普遍困难的宏观背景下，这些企业难以独善其身，步履维艰。皖中机械厂调整搬迁到马鞍山市后，由于企业生产难以为继，只能以分散方式并入马鞍山市70多个单位中。“皖东机械厂调迁到合肥市后，无法继续生产，不得不寻求被当地企业兼并，以维持职工生活稳定”。⁹从以上实例考察，部分困难企业调迁对于接收城市而言是一种负担。接收城市在这些企业搬迁过程中不仅要帮助企业解决搬迁资金的问题，同时还要妥善安置企业职工。

由上可见，后时代小三线企业对所在地经济社会建设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在20世纪末国有企业整体困难背景下，这些企业囿于历史发展大势，困难重重，使之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贡献有所局限。

参考文献:

- [1]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的报告[Z].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8-178-26, 1981-4-6.
- [2]李云，张胜，徐有威. 安徽小三线建设述论[J]. 安徽史学，2020, (05):159-168.
- [3]九三二四厂志编写组. 九三二四厂志（第二卷）• 1986—2003[M]. 2004:39.
- [4]第二卷厂志编写组. 安徽省红星机械厂厂志（第二卷）• 1986—2006[M]. 2007:327.
- [5]安徽省淮海机械厂[J]. 机电新产品导报，1996, (Z1):68.
- [6]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合肥市志（1986—2005）• 中册[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691-692.
- [7]本书编委会. 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M]. 北京、香港：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281.
- [8]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 军事工业志[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30.
- [9]第二卷厂志编写组. 九九〇厂志（第二卷）• 1986—2003[M]. 2004:56.
- [10]本书编委会：地方军事工业[Z]. 北京：内部发行，1992:14.

-
- [11]关于协调调拨迫 1-甲引信的报告[Z]. 安徽省档案馆藏, 档号: 161-1-202-5, 1975-9-18.
- [12]关于我市三线企业搬迁进展情况和要求解决问题的汇报[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22-001-1087-001, 1991-8-8.
- [13]关于灯芯绒集团公司兼并安徽第二针织机械厂落实情况的报告[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45-002-1119-003, 1998-2-25.
- [14]陈大众. 皖淮机械厂: 风雨兼程四十年[N]. 安徽经济报, 2006-3-14 (04).
- [15]关于红星机械厂情况的调查[Z]. 合肥市档案馆藏, 档号: 071-1-0052-001, 1994-12-20.
- [16]关于皖西化工厂情况的调查[Z]. 合肥市档案馆藏, 档号: 071-1-0052-001, 1994-12-20.
- [17]刘征田. 安徽重要建设项目概览[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134-135.
- [18]关于安徽省红星机械厂与港商举办合资企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Z]. 合肥市档案馆藏, 档号: 017-03-0855-006, 1995-12-22.
- [19]关于同意安徽省金光钢厂在深圳市与深圳国晖贸易有限公司联办“工贸公司”的批复[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36-001-0876-058, 1993-9-20.
- [20]关于转报金光钢厂请求补充流动资金贷款的报告[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34-004-0228-051, 1998-7-28.
- [21]第二卷厂志编写组. 九三七三厂志(第二卷) • 1986—2005[M]. 2006:5.
- [22]关于安徽省江北机械厂新上中小型装载机及小型挖掘铲土机项目建议书的报告[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36-002-1536-027, 1994-5-5.
- [23]关于申报安徽先锋机械厂破产项目的情况汇报[Z]. 合肥市档案馆藏, 档号: Q1-WS-Y-1999-0305-001, 1999-4-12.
- [24]关于转报安徽省淮河机械厂《关于急需解决生产流动资金的报告》的请示[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45-002-1129-005, 1998-3-30.
- [25]关于要求解决拖欠并且增加退休工资的人民来信[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45-002-1441-007, 2000-7-22.
- [26]贾康, 赵全厚. 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 • 财政税收卷(1978—2008)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45.
- [27]陈清泰. 重塑企业制度: 三十年企业制度变迁[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63.
- [28]关于金光钢厂破产后职工安置费用解决的承诺函[Z]. 蚌埠市档案馆藏, 档号: J059-003-0381-009, 2000-8-4.
- [29]程堂义, 汪千永. 为合肥注入新鲜“血液”的军工企业[N]. 合肥晚报, 2018-8-2 (A09).

[30]厂防汛工作第一次会议纪要[Z]. 合肥: 安徽神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皖西机械厂)档案室藏, 档号: 1993-2-2-8, 1993-7-18.

注释:

1 1981年6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各省、市、自治区执行。参见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的报告[Z].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 B1-8-178-26, 1981-4-6。本文“后小三线建设企业”, 特指1981年至今近40年的时间段内, 发端于小三线建设的企业。

2 参见张秀莉. 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J]. 安徽史学, 2014(06):145-153; 李云, 张胜, 徐有威. 安徽小三线建设述论[J]. 安徽史学, 2020(05):159-168。

3 黄巍. 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三线调整——以辽宁新凤机械厂(1965-1999)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38(08):126-134; 徐有威, 张志军. 得失之间: 江西小三线“军转民”问题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8(04):111-119; 徐锋华. 东至化工区建设述论——上海皖南“小三线”的个案研究[J]. 安徽史学, 2016(02):147-154。

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小三线企业多有合并、重组, 并逐步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名称亦发生变化。为示区别、方便表述, 本文将进入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统称为后时代小三线企业。

5 资料来源: 采访朱皖北(原通用机械厂党委书记), 2020年6月4日, 安徽合肥。

6 1991年至2008年是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时期。在此之前, 城镇职工退休“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保险待遇, 由企业负责养老保险的发放”, 参见封进, 赵发强. 新中国养老保险70年: 经验、问题与展望[J]. 社会保障研究, 2019(06):16-26。2000年前后, 淮河机械厂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金仍是企业发放。

7 部分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困难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1. “九五”期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国内有效需求下降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八五”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通货膨胀, 这一时期国家财政紧缩。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亦对外贸造成影响。2. 改革深化, 国有企业体制保护伞逐步取消。3. 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 对国有企业造成冲击。4. 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有企业自身生产、组织模式和发展观念难以适应市场供求关系转变, 即国有企业长期适应的计划经济生产体制使其习惯于低水平重复投资、建设, 各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 企业轻开发、重生产, 技术含量低, 难以适应市场。5. 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重, 主要表现为过度债务、人员富余、企业办社会(包括厂办学校、厂办医院等)。6.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没有根本性转变。如“职工能进不能出、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收入能高不能低”的问题仍然存在。参见陈清泰. 重塑企业制度: 三十年企业制度变迁.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54-56。

8 参见黄岳忠. 安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实践探索(1997-2002).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347-353。

9 资料来源: 采访韦久跃(原皖东机械厂党委书记), 2020年5月28日, 安徽合肥。